

王铭铭 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6

第6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王铭铭 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6

第6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6辑/王铭铭主编.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公司, 2008. 5

ISBN 978-7-5062-8770-8

I. 中... II. 王... III. 人类学—文集 IV. 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089 号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

著 者: 王铭铭

策划编辑: 吴兴元

责任编辑: 马春华

营销编辑: 邹长斌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1-3086)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页 3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读者咨询: 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062-8770-8/Z · 252

定 价: 36.00 元

学术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戎(北京大学)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

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

张江华(上海大学)

张跃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周大鸣(中山大学)

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

徐新建(四川大学)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于华(清华大学)

彭兆荣(厦门大学)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

潘 蛟(中央民族大学)

本辑主编助理

伍婷婷 杨清媚 曾穷石

稿 约

一、《中国人类学评论》(以下简称《评论》)为文集,自 2007 年初起,半年出一辑,是兼有评论性、记述性及思想性的学术评论集刊。

二、《评论》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评论》作为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当代民族问题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科研成果出版,受该基地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有关科研经费资助。

三、学术编辑委员会由来自国内不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部分中青年专业工作者组成。

四、《评论》内容以社会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为主,不排斥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学者之作品,主办单位视培养年轻一代学人为己任,故将开辟相当篇幅供新生代学者发表其作品(特别是述评、书评及研究札记)。作为学术探讨平台,《评论》将视具体情况,亦开辟相当篇幅选刊相关主题的已发表论文。

五、《评论》每期字数在 20 万字左右,可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1. 学术论文;
2. 对话、辩论或学者访谈;
3. 田野札记或学术随笔;
4. 研讨会纪要;
5. 讲座;
6. 述评;
7. 书评等。

六、作为资助出版物,《评论》初印(3,000 册)时不付稿酬,但重印时将支付版税。

七、投稿电子邮箱为:wangmingming2006@gmail.com。

《中国人类学评论》学术编辑委员会

2008 年 4 月

西学与国族

- “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 王东杰 ... 1
- 拉克伯里学说与清季中国——关于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个案研究 李 帆 ... 30
- 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中国现代经史研究的拓展
——以《尔雅·释亲》研究史为例 赵满海 ... 42

跨学科讲坛

- 文明缘何难上山? James C. Scott ... 72
- “女人为母,男人为子”——纳日人的人观 翁乃群 ... 81
- 关于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反思 马 戎 ... 95
- 意象、意境、美与艺术 陈 凌 ... 123

追 忆

- 人类学家严汝娴教授访谈录 曾宪石 ... 140

文化人类学席明纳纪要

- 韦伯的社会学、行动理论与宗教社会学 苏国勋 ... 165
-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赵丙祥 ... 169
- 人类学的表征危机与地志学转向 朱晓阳 ... 174
- 创意产业的演进——创意集群、创意公民和社会网络市场 Terry Flew ... 177
- 新游戏、新规则——人类学的危机时代 Alain Le Pichon ... 179
- 李庄——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 陈代俊 ... 182
- 李济与李安宅——学科史的个案研究 陈代俊 ... 184
- 迈进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领域的一种描述和展望 高丙中 ... 186
- 莫斯与杜蒙——社会学派的人类学 梁永佳 ... 188
- 对编写《中国人类学史》教材的一些思考 胡鸿保 ... 190
- 民族志研究的反思与口述历史研究 郭于华 ... 192

涂尔干的社会理论	渠敬东 ... 195
----------------	-------------

学术会议纪要

“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王铭铭 杨正文 彭文斌 ... 199
“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研讨会纪要	潘 蛟 ... 209
“文明与民间宗教”研讨会纪要	王铭铭 ... 230

人类学实地研习营

第四届人类学研习营活动报告	梁永佳 伍婷婷 郑少雄 ... 237
---------------------	---------------------

述 评

“表征危机”的再思考——戴维森和麦克道威尔的进路	朱晓阳 ... 244
理解《初民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兼评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发展	储卉娟 胡鸿保 ... 252

书 评

《金翼》	林耀华著 常利兵评 ... 259
《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	乔 健著 郑少雄评 ... 262
《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薛艺兵著 李丽敏评 ... 266
《中国大陆 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	萧 梅著 韩锺思评 ... 270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华南卷)	曹本冶主编 黄 虎评 ... 273
----------------------------	--------------------

《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	齐一琨著 高贺杰评 ... 277
----------------------------------	-------------------

《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	张振涛著 吴 凡评 ... 280
---------------------------	-------------------

《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	瞿明安著 陈玉平评 ... 284
------------------------------	-------------------

稿 约

西学与国族

“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

思想取向 (1895—1905)^①

王东杰

1895年2月,严复在一篇讨论“世变”的文章中指出,近代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而成,而是根源于中西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其中,又以历史观的不同最为重要:“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立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即盛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②

在严复的描述中,中国历史观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在价值论的层次上“好古而忽今”,将理想悬于远古的“三代”,不无退化意味;在历史变化“规律”的层次上,相信治乱兴衰的循环论。然而,历史观不仅是看待既往的方式,也是看待现实和未来的方式。不管是退化论还是循环论,一旦与厚今而求进的西式历史观相遇,便立即不堪一击,终致“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故尔,欲与外人争胜,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人的历史观念。

此论对时人显然极具说服力。此后大约不到十年时间,“进化”就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中一些活跃人物及其追随者们不言自明的“公理”和口头禅。整个20世纪,这一信仰虽有时遭受现实的挫折,但基本上仍成为近代中国最核心的信仰之一。^③

近年来,已开始有学者对进化观在近代中国的确立过程及其广泛影响进行

① 文稿曾承罗志田、章清、许纪霖等先生批评指正,刘世龙先生在资料上予以帮助,谨此致谢。文中错误由本人负责。

② 严复:“论世变之亟”,收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③ 强调进化观念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思想中并无异质观念的存在。事实上,即使在当代民间思想中,基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经验的循环论思考方式依然影响深远,不少人仍以此“模型”描述20世纪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

了较为系统的探讨。^① 这些成果揭示出,进化论的思想意义更多地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疏离于沉沦的现实并走向未来的道路。其次,进化论的引入,是建立在近代中败西胜的现实基础上,且因树立了胜优败劣的价值观而强化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进而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化向西走和激进化的趋势。

这些观察自然不错。不过,也应注意的是,时人既主动向对手学习,即意味着在他们心中尚存中国能够由败而胜的希望。昔扁鹊见蔡桓公,病愈危而辞愈烈。及至病在骨髓,则一言不发,望而却走,或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代一些猛批中国传统的思想家的心态。1907年,严复在为英敛之《也是集》所写的序中说:“今夫谋国之士,同诊疾之医,惟所遇之犹可以生,故其词滋危,其说弥厉;若明知其无可为力,则戚者失声,疏者却走,又奚晓然负建鼓以求亡子为?”^②正是典型的“爱之深而责之切”。

胡适曾说,他接触到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便“很容易的与几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联了起来”。^③ 李济则云:“记得小时初读严几道所译的《天演论》,最欣赏的是译文的声调铿锵。”^④ 这些回忆与通常强调的进化论对近人竞争意识的启发多少都有一些距离,表明读者对此观念接受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它们也提示出进化观念能为中国人顺利接受,固因其揭示了时代问题并提示了解决方案,但也和传统中某些具体取向有关。这些来自过去的思想资源,使中国人在面向未来的过程中,对进化论的理解亦有与其西源不尽相同的特点。当然,除了明确地回向传统寻找理据的公羊三世说外,时人多非有意为此。但他们在大规模接触西学之先,已先有充分的中学训练,故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传承着一些已定型的文化观念,在历史观的方向性转变中体现出有因有革的内在脉路。儒家经典中强调面对问题而自省的“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及积极进取的“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取向对近代中国进化观念的影响尤为明显。对于这一更为“中国”的面相,前人似尚注意不够,此处即欲就此问

① 目前系统研究近代中国思想中的进化观念的著作有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这些著作对于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及其与各种思潮的关联都做了详细的讨论。

② 严复:“《也是集》序”,见《严复集》,第2册,246页。

③ 胡适:“我的信仰”,见《胡适全集》,第1册,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④ 李济:“人之初”,见《考古琐谈》,27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题略加发挥,以为拾遗之助。^①

曹聚仁曾说:“几乎每一个上一辈文人,都说他们读到《天演论》的向往之情。”^②但正如也说过类似话的胡适所云:“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③当时不少人接受进化观念,恐怕都更多地是通过报章杂志的介绍(而后者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进化思想的影响)。就此而言,20世纪初一度以报人自居的梁启超,在这一观念传播的过程中,或较严复更为重要。因此,本文以梁启超为叙述线索,或可代表时人的一些共相。

一、起步未久的竞争

中国人接受进化的观念并不自严译《天演论》始,此前有关进化论的一些观念就已在流传,惟多处于零星状态,未像严译一样产生强烈的冲击力。^④另一方面,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康有为已开始将公羊春秋“三世”古义阐发为历史的单线进化观。这一追求“进步”的思路到底是康有为自发的认识,还是受了严复的启发,说有不同。但即使康有为发明此义在他读到严译之前,仍不能确认这一思想未受“西学”的影响。不过,在具体的内容和思路上,公羊三世说无疑更多地取自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

回向中国古典寻求理论依据和援据西来学说(不管在细节上有多少变化)的取向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对中西文化价值估计的不同。严复与梁启超关于中西历史上有无民主的一次讨论便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1896年,梁启超在古议院考一文中,将上古一些制度比附为“议院”。不久,严复写信给梁启超提出异议。梁氏回信一方面表示这种“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的做法正是自己最讨厌的,承认此说“讹谬”;另一方面又对严复所说“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的话表示不以为然,云:“西史谓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启超以为彼之世非民主也。若以彼为民主也,则吾中国古时亦可谓有民主也。”按照公羊三世说,“据乱

① 在这方面,仍是严复被关注得较多。除了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美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外,较为全面性的考察可见余英时:“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104~12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②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8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③ 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全集》,第1册,71页。

④ 关于严译之前中国的进化观念,参考马自毅:“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至1898年”,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古代的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歴史意識をめぐって”,载《思想》,第792号(1990年6月),东京:岩波书店。

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因此,“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从西学证据看,“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岗岩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鼯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即有民权之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①按严译《天演论》初译稿开篇即谓:“地学之家积验各种僵石,知动植万品,率皆递有变迁”云云。^②其时梁启超已读到这一稿本,此处的引用极可能受了此段启发。具体论点刚好相反的双方均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已经预示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思想语境下的弹性。

细看下文可知,梁启超对于民主乃世界古来所未有一句致意再三,其实并不着意于这一问题本身。他关注的乃是中西历史的差距问题。盖如果西人早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已有民主,而中国迄今尚无,岂非已在历史的跑道上相差过远,只能瞠目其后?西人民主不但不能追溯到希腊罗马时期,且其走上兴盛之路,亦不出百年而已。这样一来,中国就不至于太落后:“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③

中西原本差不多而迄今相差亦不太大的看法,并非在与严复书中首发。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据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记述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自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因此,西人看似先进,其实也只是刚刚开始起跑不久而已。吾人如能像西人一样“幡然而变”,则“不百年间”亦能“淳然而兴”。^④反之,西人虽文明,离文明的极点仍然相去遥远。梁启超根据康有为的判断说:“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一二分距离八九分固然甚远,但站在一百分的立场上看,则差距实在甚小。因此,“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⑤

文明程度并无精确的计量标准,一二分和八九分的差别看似精确,实际仍是模糊而可以伸缩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不少人的共同认知。直到1918年,吴稚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论“今日欧美的物质文明”非“西学”也,

①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本文引用的梁启超文字,均来自《饮冰室合集》,下不一一注明。

② 严复:《天演论》手稿,见《严复集》,第5册,1414页。

③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109页。

④ 梁启超:“变法通义”,第1册,“文集之一”,6页。

⑤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109页。

“乃是人类进化阶级上应有的新学”时还说,“科学理想”已在世界上普及,“不过在这发脚的时节,西方人已经直接的应用在科学与机器,我们止间接的应用在汉学考据”。但这也关系不大,“早晚应用起来,或者一千五百年后的‘未来黄帝’还生在东方。那么,现在初期的发脚,东西相差一百搭八十年,六千年后的人类当然无所感知,看做我们同时发脚罢了。”^①

不久,梁启超对中国在“三世”中所处地位的估计稍有不同:“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中国乃以“独术”治群,西人则以“群术”治群。据此,中国已自“一君为政”的升平世降到了“治群多以独”的据乱世,与西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过,如以“三世说”的最终理想为准,则西人去道犹有一间。盖“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②

不惟如此,如放在全世界历史进程的格局内看,至少在政体方面,中国是与英国同类的:“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国言之,则可谓为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国言之,则可谓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③那时的梁启超认定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渐为美国超出,但仍较法国先进),中国既能与英国处在同一阶段,而超前于“全局”的多君之世,可知也并不算落后到哪里去,而“群龙无首”的极乐世界尚需等到“千百年之后”。

进一步,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又本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之进无穷极也。以今日之中国视泰西,中国固为野蛮矣。以今日之中国视苗黎猺獐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红人、巫来由之棕色人,则中国固文明也。以苗黎诸种人视禽兽,则彼诸种人固亦文明也。然则文明野番之界无定者也,以比较而成耳。今泰西诸国之自命为文明者,庸詎知数百年后,不见为野番之尤哉!”^④在这里,梁启超将人种进化放在一个“先后”比较的序列中,且暗示后来可以居上,无疑意在使中国人从目前的野蛮状态下通向一个更文明的未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野之分是没有意义的:“文明野番之界虽无定,其所以为文明之根原则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今泰西诸国非不知公之为美也,其仁人君子,非不竭

① 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见《国音国语国字》,第1集,18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② 梁启超:“说群序”,第1册,“文集之二”,2页。

③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第1册,“文集之二”,11页。

④ 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第1册,“文集之一”,94页。

心力以求大功也。而于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各私其私之根原不知所以去之。是以揆诸吾圣人大同之世，所谓至繁至公之法律，终莫得而几也。故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无尽，吾之愿亦无尽也。”^①文野之界无定而原则有定，国人乃可寻此方向而进。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之败是在历史进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而非最终的竞争结果。他指出，世界上一切物种的进化，无不遵循着自劣而优的道路：“追原有生物之始，同是劣种而已。而其后乃能独有所谓优种，以别异于群劣种而战胜于他种者，何也？数种相合，而种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广，而其改良愈盛，而优劣遂不可同年而语矣。”优劣乃后天差异，完全可以改变。若“以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相较，其为优为劣，在今日固有间矣。至其末后之战，胜败如何，则未能悬定也。”因此，关键的胜负不在“今日”，而在未来（“末后之战”）。^②

此时已有不少人开始逐渐接受西人文明而中国野蛮的判断。不过，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的夷夏之辨允许“夷狄”可以进而为“华夏”、“野蛮”进而为“文明”，也反过来承认由华夏退而为夷狄的可能。^③虽然包括严复在内的时人多以为西人已经到了“一治不再乱”的境界，为之艳羡不已，故对其历史中“退化”的一面着意不多，梁云西人有在将来变为野蛮的可能性，也主要是“世界进化不已”一句的逻辑推论。但熟习《春秋》的他将不同种群的差别放在后天的竞争序列中，显然受到这一更具开放性的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其中，“今泰西之自命为文明者”一句之“自命”二字，尤堪玩味，自是针对西人文明论中种族主义色彩而发。不过，这段话更重要的意义仍然落实在中国。盖只要进化之门没有关闭，中国便仍有希望。

梁启超在运用文野可变论的同时，也不忘记把“苗黎獠獠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红人、巫来由之棕色人”拿来与中国对照，并在此比较中为中国寻到一个可上可下的位置。类似的看法亦可在1903年发表在《大陆》上的一篇不署名文章里读到：“吾见世之论中国人者，动曰野蛮也，暗弱也，固陋也，埃及、印度、土耳其人之流亚也。此等谬悠之论，殊不足以定中国人之价值。夫中国人之地位诚劣，然引埃、印、土等人种为比拟，则未免流于极端。盖彼等不惟无国民之资格，亦且无个人之资格，……若中国人则个人之资格甚优，其所以屡受外界之殊创奇辱，而无一愤起以自立者，则以国民资格薄弱之故也。”^④这些言论体现出时人在反

① 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第1册，“文集之一”，94页。《梁启超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② 梁启超：“变法通义”，77页、78页。

③ 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载《中国文化》，第14辑，213～2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

④ “中国之改造”，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第1卷，上册，420～4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对种族歧视的同时,也部分接受了种族主义观念,不过,其针对的主要还是将中国过分野蛮化的危险。盖黑、红、棕种人已为白人所灭,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而中国主权尚基本完整,危局便不至不可收拾。劣而不甚劣,通过“改造”而进化才分外地有必要且有可能。

1901年,已经因为变法失败而流亡的梁启超写了“过渡时代论”一文,指出这是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代,延续了进化相对论的思路。^①不久,杨度在一段从词汇到思路都明显受到梁氏影响的文章里,对此做了更为清晰的表达:“今日外人之呵我中国也,不曰老大帝国,则曰幼稚时代。我国之人,闻而恶之。呜呼!此无足怪也,过渡时代之现象则然也。……夫天下万事万物之进化,何一非老大与幼稚两现象后先相禅以成之者耶?又何一非老大与幼稚两现象同时并立以成之者耶?推之欧洲各国而皆然,推之日本亦何莫不然?”因此,中国如能“乘此迎新去旧之时而善用其老大与幼稚,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夫岂难耶?”如是,“则今日之以老大与幼稚号我者,我等虽长奉之以为达尔文所谓进化之代名词可也。”^②

另一方面,王尔敏先生注意到,19世纪中叶以来,受到时变刺激,不少学者借助于邵雍的“元会运数”之说解释世局之变,形成了独特的“运会说”,并将时人相关言论详列一表。^③惟其中未提及康有为的“地运说”,而此说实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那一时期梁启超对中国未来的信心。1897年,梁氏在一篇宣布中国即将强盛的文章里引述了这一说法:

吾闻师之言地运也:大地之运,起于昆仑。最先兴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伦,而埃及。渡地中海而兴希腊沿海股,而兴罗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兴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兴法兰西,穿海峡而兴英吉利。此千年以内,地运极于欧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兰,若瑞士,若德意志,则咸随其运之所经,而一一淳起。百年以内,运乃分达。一入波罗的海迤东以兴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兴美。三十年来西行之运,循地球一转,渡大东洋以兴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运率甚速。当渡黄海、渤海兴中国。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以为之过脉。今运将及矣。东行之运,经西伯利亚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昔终始五德之学,周

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第1册,“文集之六”,27~28页。

② 杨度:“《游学译编》叙”,见《时论》,第1卷,上册,247~249页。

③ 王尔敏:“近代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43~35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秦儒者，罔不道之。其几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面，非毁之者也。以人事言之则如彼，以势言之则如此。呜呼，西人虽欲犬马我，奴隶我，吾奚惧焉！吾奚馁焉！^①

大约在同时期（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孙宝瑄也在日记里运用了“气运说”预言民主时期的到来：“三代之君皆称王也。王之先则有五帝，帝之先则有九皇，皇之前则称民。三代而下，其君又莫不称帝也，则是王之后又有帝矣。今欧亚诸大邦皆称皇，是帝之后复有皇矣。地球不久尽变为民主，是皇之后复有民矣。名号者，至微末事，而足以觐大地终始之气运。”^②

或者正是由于“地运说”或“气运说”的理路太过近于“终始五德之学”，而与渐渐兴起的科学观念凿枘不合，梁启超很少提及此说。不过，在1902年讨论世界大势的一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到五年前美国吞并夏威夷事件的影响时说：“前此美国势力，全发挥于欧洲，固由其民族相切近，亦由大西洋为文明之中心点。美国东部先发达，职此之由。今则文明之中心移于太平洋，故美国文明，亦日趋于西部。”其经营菲律宾，便是这一过程中的一步骤。^③这里并未直接称引康说，文章的基调也远不如前乐观，但仍可看到“地运说”的影子。

其实严复也是运用类似观念的一人。他在1895年说：“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④运会说与进化论均带有决定论色彩。因此，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在已经接受了进化观念的人们那里并未完全死亡，至少一度是可以相通的。

二、“竞于理”与“竞于力”

进化论对于竞争的强调在中国引发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使此前已隐藏在不少人观念中的重力尚武倾向得以明朗化。^⑤不过，竞争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并不一定要诉诸“力”，相反，在这一观念刚被引入的一段时间内，不少人试图将竞争与“理”连在一起。严复本人就相当强调判断“民种”高下当依据“民力、民

① 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第1册，“文集之二”，16页。

②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91～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③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第2册，“文集之十”，22页。

④ 严复：“论世变之亟”，1页。

⑤ 参考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2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智、民德”的综合标准,并进而提出“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的全面进化途径。^①随着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日趋激进,严氏更为强调“德”在竞争中的重要性。1906年,他宣布“西人所最讲、所最有进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学。总而谓之,其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然“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②1907年,他再次指出:“国与国而竞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也,非以力欤?虽然,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及其至也,既强不可以复弱,既盛不可以复衰。”^③因此,真正的竞争是合德、智、体三者而言的,并不徒赖“力”之一端。

1902年,梁启超本人在讨论斯巴达历史时有感而发,说:“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岂惟智力之为急,抑体力亦特重也。”^④这番话其实与他此前的观念并不一致。戊戌时期,梁启超已基本认为“力”在世界竞争中渐趋式微:“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胜,太平世以智胜。”近百年来,“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相信:“世界之进化愈盛,则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强。”^⑤

梁启超将世界进化理解为由力争到智争的过程,与严复强调合力、智、德于一体的思路颇为近似,而当时抱有类似意见的人也还不少。梁启超即曾引用唐才常的话:“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也。通商传教,觅地布种,其粗迹也。其政学之精进不已,駸駸乎突过乎升平,无可惧也,无可骇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运,而生吾中国之动力也。”^⑥此处虽云“动力”,而实以“政学”为本。唐氏又追溯上古以来的人禽竞争、人种竞争史,发现“群”与“智”乃争胜之本,进而提出强种三术:“以开通强,以智学强,以仁群强。彼以种来,我以种往,土商杂沓,网罗四张,是谓开通。格致既辟,天人斯穷,政法律例,机牙肆应,是谓智学。平一国权,平万国权,大同之轨,于斯萌芽,是谓仁群。”其中,“开通”与“智学”二术“英美德法日本庶几行之,仁群则未也”,至“中国则无一焉”。不过,其时中国“开通”之机已露,“如继

① 相关论述参考王尔敏:“德、智、体、群四育的缘起”,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139~14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见《严复集》,第1册,167~168页。

③ 严复:“《女子教育会章程》序”,见《严复集》,第2册,252~253页。

④ 梁启超:“斯巴达小志”,第6册,“专集之十五”,9页。

⑤ 梁启超:“变法通义”,78页。

⑥ 梁启超:“说动”,第1册,“文集之三”,39页。

之以智学,终之以仁群”,则“凡有血气,同我太平,宁强之足云?”^①

1897年,皮锡瑞在长沙南学会的演讲中,也提到竞争“以智不以力”的观念:“今红种、黑种为白人剪灭殆尽,……惟白人独盛”,固“由于强弱不同,实由于智愚迥异。”盖“红种、黑种皆野蛮不知学问,虽性情犷悍,能以力强,不能以智强,故虽竭力与白种争,终为白种所剪灭。强以智,不以力。”按此标准,黄种人处在白人与红黑人种之间:“我黄种之人,聪明才力,不在白种之下。凡白种所能为之事,黄种无不能者。东洋一切制造,皆能仿效西人。今中国亦有能仿西人制造者。中国人出洋学习,其智慧多为西人推服。然中国虽有此智慧,未能讲求开通,智者自智,愚者自愚,其智者足与白种抗衡,其愚者亦与红种、黑种相去不远。”^②由于中国人智愚分化严重,故整体上不能与西人争胜,然也尚不至为西人剪灭殆尽,因此是希望与危机并存,进退皆有可能,端赖人为。

世界竞争已主要成为“智”的竞争,学习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当时最为流行的看法之一就是强调“学能进种”。张鹤龄云:“夫天下之政,则天下之学而己矣。……政以保邦,而学能进种也。进种之效,能使顽者化,固者通,劣者纯,陋者文。如果木之植,经园工之移接,而果实繁大,与原种迥殊。又如育蚕之法,察其病恶,加之厘剔,而茧丝一律纯美。学之益于人生亦如是矣。”^③章太炎亦曰:“不学,则遗传虽美,能兰然成就乎?”^④张鹤龄使用的“园艺”的比喻及章太炎对于“遗传”的看法,恐怕都更多地受到严译的启发,表明在“力”之外,时人对于进化论的接受与理解还有一条“学”的道路。

清季人爱说的“学战”一词,也可放在这一思路下理解:“二十世纪学界之风潮,不得不汲汲于进化。何也?处生存竞争之世,利害之烈莫甚于学战”,故“学界不进化,即合秦始皇、成吉思汗、拿破伦为一人,不能横行一步。”^⑤是则进化已主要体现在“学”的方面,学界之责可谓大矣。严复亦曰:“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⑥

① 唐才常:“各国种类考自叙”,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册,120~1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皮锡瑞语载在《湘报类纂》,乙集,卷下,13页。此处转引自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85页。

③ 张鹤龄:“学豫篇”,见《晚清文选》,卷下,126页。

④ 章太炎:“馥书?族制”,此处引用出自徐规:《馥书详注》,3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⑤ 云窝:“教育通论(节录)”,见《时论》,第1卷,下册,551页。

⑥ 严复:“论教育书”,见《时论》,第1卷,上册,107~108页。